■军事理论

首战即决战

□杜桂华

以信息化为核心和本质的世界新军事变革，使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战争正在从机械化战争阶段进入信息化战争阶段。“首战即决战”是信息化战争的重要特征之一。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随着原苏联的解体，世界两极格局被打破，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科技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开始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世界军事领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全新的作战样式和智能化的武器装备应运而生，高技术局部战争登上历史舞台，从而给现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

（一）战争目的的有限性和军事理论的不断创新，为“首战即决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首战即决战”是指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由于战争双方力量对比过分悬殊，具备绝对优势的一方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做后盾，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优势，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智能化武器装备，通过首战即完全战胜敌人，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实现其相对有限但仍具战略意义的目的。纵观人类战争史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发生在各国之间的战争，尽管原因很多，但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攻城掠地，或为扩大本国版图和势力范围主动进攻他国，或为保卫本国领土而奋起自卫，如苏德战争和中日战争。这种战争目的决定了战争双方打的必定是攻坚战或是阵地战，就战争时间而言往往大都是“持久战”，任何一方都难以做到“首战即决战”。

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其战争目的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起因虽还是利益之争，但交战双方战争目的比较有限，一旦将对方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摧毁，就基本达到了战争目的，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作为占据优势的美方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基本实现了“首战即决战”。正是由于战争目的的变化，军事理论不断创新，自1970年代原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首先提出新军事技术革命理论后，现代军事理论又有了很大发展。例如，美国军事专家提出了“网络中心战”理论、“信息化战争”理论、“太空战”理论，俄国军事专家斯利普琴科提出“非接触战争”理论，并将其称之为“第六代战争”。这些军事观点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军事理论的发展，而且对战争实践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使“首战即决战”有了重要的军事理论基础。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不断改进，为“首战即决战”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首战即决战”是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古代漫长的人类战争中，由于受生产力的制约，用于作战的武器只能是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军队打仗一般都是利用人海战术，采取刀对刀、箭对箭、面对面的作战方式，因而古代的每一场战争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任何一方都难以通过一战而取得决胜。火药发明以后，武器装备由冷杀伤发展到热杀伤，武器装备先进的一方已占有明显优势，如英国就是在这一时期靠着先进的武器到处侵略扩张，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众多的殖民地，曾自诩为“日不落帝国”，但英国的势力范围也都是长期征战的结果。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坦克、飞机、大炮和军舰等先进兵器出现在战场，使军队作战方式逐步由传统的地面战争向立体战争演变，但要实现“首战即决战”往往也十分困难。战争发展到现代，以海湾战争为转折点，世界新军事变革进入一个新的质变阶段。随着尖端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武器装备呈现出智能化趋势，特别是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各种精确制导武器逐步成为战场的主角，超视距打击成为现实，现代化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地位日趋突出，依靠先进武器装备占据的优势，再加上强大的综合国力，为“首战即决战”打下了强大的科技和物质基础。

（三）作战理念的更新和作战样式的不断变化，为“首战即决战”提供了重要的实战基础。

战争目的的有限性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带来了作战理念的更新，从而使作战样式不断变化。从世界近期几场局部战争看，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对抗，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已发展为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并且呈现出作战样式体系化的态势，特别是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的极大提高，战争节奏和进程明显加快，战争目的更加有限，战争阶段不再明显，“首战即决战”的特征表现得更加突出。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还可以分为战争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那么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则使现代战争出现了非对称、非接触、非线性的特点，使作战的前后方模糊、区别淡化，战争进程已分不出前、中、后三个阶段。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美英联军30万大军参加作战，从2003年3月20日进行空袭开始，到5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主要战争基本结束，用了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战争规模和战争进程而言，可以说是一场典型的高技术条件下的“速决战” 并成为“首战即决战”的一个成功范例。

■当代世界军事

2003年日本军事发展回顾

□袁杨

近年来，日本在“政治大国化”的国家战略牵引下，其军事发展正呈现出战后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劲势头。以摆脱政策羁绊为先导，走内外结合型的发展道路已成为日本军事发展的一条鲜明的主线。在刚刚过去的2003年，这一特征依然十分显见。

长期以来，日本在“和平宪法”的规制下，在表象上走的是一种“自我约束型”的军事发展道路，曾先后制定过“专守防卫”、“禁止向海外派兵” “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自律性政策规定。对于冷战后日本的军事发展而言，这些“障碍”是不得不面对的。为此，日本在政策调整上，始终将法理突破置于首要位置。在策略上，日本背靠日美同盟，以“对美合作”为由，巧妙回避了国内政治的制约。在时机的把握上，日本极善于捕捉一些稍纵即逝的“契机”，从海湾战争时的《国际和平合作法》到阿富汗战争时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2003年，日本在防卫政策上寻求突破的契机是3月20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战争打响后，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作出明确表态，对美英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给予“理解和支持”，并表示“日本将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积极参与对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在这一“支持和参与”的立场之下，相关的防卫政策调整开始进入紧锣密鼓的实施阶段。

6月，《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正式施行。“有事法制”作为一套相关法律体系还包括《应付紧急事态基本法》 《国民保护法制》、《支援美军相关法制》、《国际人道法相关法制》及《支援自卫队相关法制》等，日本政府计划在一至两年的时间内分步完善。这一具有“国家紧急事态法”性质的“有事法制”从酝酿到最终出台，前后历经26年的时间，这足以说明其重要性和敏感性。“相关三法”作为突破口，其重要意义自是不言而喻，日本防务界人士甚至将其作为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象征。就其内容而言，其中所包含的极具主观色彩的“推断有事”概念以及建立在绝对权限之下的全民动员体制等内容均可能预示着日本防务政策将产生根本性转变。

7月，日本国会通过《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据此，日本政府于2004年年初向至今仍处于乱局之中的伊拉克派遣千人规模的自卫队。这其中的要害主要有二：一是首开日本战时直接向冲突地派遣自卫队之先例，二是为日本在不经联合国授权和冲突当事国政府认可的前提下实施自卫队的海外派遣打开了法理之门。

下一步，日本将在进一步完善“有事法制”相关法律体系的同时，为自卫队的海外派遣制定“恒久立法”，并准备将相关内容写入即将修改的《防卫计划大纲》之中。由此看来，目前，除宪法第九条外，制约日本军事力量走向外结合型发展道路的政策因素均已荡然无存。何况，就目前来看，修宪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自卫队成为有名有实的国防军已是大势所趋。

在此背景下，新时期日本军事战略基本调整到位，其长期恪守的“专守防卫”原则已然被彻底摒弃。具体表现为：一是军事力量的职能由“自卫型”转变为“自卫与外向型”相结合的体制，自卫队已在事实上完成了向“正常国家”的“正常军队”的角色转换；二是战略方针由以往的“被动御敌”转变为“先发制人”，具有鲜明的主动先期威慑性格；三是基于其广义“周边事态”理论，军事力量的运用范围由日本周边扩展至全球，以“支援美军军事行动”为名实施“海外干预”将成为自卫队又一主要战略任务；四是继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并以最终确立日美联合作战体制为战略目标。这一全新的军事战略似可描述为以“主动先制”为手段的“本土防卫与有选择地参与”军事战略。

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自卫队在军事力量性质与军事能力方面的全面转型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2003年以来，其在体制编制调整及武器装备发展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动作。

2003年年初，参联会提交了《联合运用研讨成果报告》，拟议改组参联会为联合参谋部，赋予其联合作战指挥权限，为未来的多军兵种联合作战未雨绸缪。在优化陆上自卫队主战部队体制编制上，陆上自卫队继续加紧对6个新型机动旅的改编，以实现地面作战部队的立体机动投送。此外，在精简整编方面，继续以陆上自卫队为主裁减员额，稳步实现“合理、高效、精干”的军事力量建设发展总目标。

自卫队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注重向大型化、远程化和高技术化方向发展。如90式坦克、“宙斯盾”级驱逐舰、F-2战斗支援机和F-15战斗机等三代主战装备仍是今后自卫队装备采购的重点。此外，13500吨级的“直升机导弹驱逐舰”已被列入2004年度防务力量发展计划，这将是其武器装备远程化和大型化再上一级台阶。

自卫队的C4ISR系统建设虽起步较晚，但由于依托其高科技优势，起点高，见效快。目前，以中央指挥所的“中央指挥控制系统”（NCCS）为中心，联合陆海空三自卫队的指挥系统构建的“防卫综合数据通信网”（IDDN）正在加紧建设之中，实现全部互联后，其自动化指挥控制能力将会大幅跃升。

在联美研发与部署TMD的问题上，日本态度积极。就目前条件而言，“宙斯盾”驱逐舰作为其海基平台，配合引进“标准-III”截击导弹，可实现海上高空拦截。下一步日美联合开发的重点主要是“爱国者-III”截击导弹和更为先进的弹道导弹侦察预警系统。考虑到日本已经拥有侦察卫星，可以认为，日本距离实际部署TMD的目标已不再遥远。

■新军事变革

美国，军事转型挑战未来

□傅岩松

911事件后，对美国安全的非对称性威胁日渐突出。美国虽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对这种不确定的威胁感到力不从心。因而，美国下决心利用相对和平和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机遇，进行全面战略性转型。自美国总统布什发表了《加速军事转型是美国第一要务》的演讲后，美国军事转型成为美国制定国防计划的关键理论，美国军事的全面变革正在步入快车道。

全方位转型

美国军事转型，不仅涉及美军建设、武器装备发展等，还涉及到美国国防机制等问题，是一场涉及广泛，影响深刻，意义深远的持久变革。美国官方明显支持转型变革并不等同于新军事革命的学术观点，认为转型更为广泛，主要是将美国军队从冷战力量转变为能够应对新安全环境挑战的冷战后军事力量。这种学术观点认为，“军事革命”仅仅是让美国军队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去和传统的军队打仗，而转型的关键则是从威胁判断出发，使美国军队能有效地应对冷战后的安全环境。因而，转型应是全方位的，主要包括三大领域。

*第一大领域，作战方式转型。*该领域转型重点在未来联合作战理论的发展。美军认为，未来联合作战理论是国防部转型战略的关键，涵盖了所有支撑美国军事能力的领域。冷战后美国接连进行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每次战争的联合作战程度都逐渐提高，并趋向于一体化联合作战。美军将分三阶段继续发展联合作战转型。近期（2-3年）联合作战行动，对作战司令部的战争计划、作战和训练的经验教训和联合条令进行修订；中期（5年）联合方案，制定出联合作战理论总框架，并指导发展四个下一级联合作战理论，即本土安全、维护稳定行动、战略威慑和大规模作战行动。远期（15-20年）联合构想，要对当前的联合构想进行修订，使其成为长期性联合作战的综述文件。可以预见，美军的联合作战理论在中长期将会有较大突破。

*第二大领域，公务处理方式转型。*美国国防部认为，目前国防部公务处理程序过多，效率不高，不能及时有效地对不确定的威胁做出反应。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称，在1962年，美国有关防务问题的审批手续只需1页纸，而到2001年，竟需534页。美国国防部每年向国会提交陈述理由的文件就达2.6万页纸。因而，办公程序的转型，要“产生适应21世纪安全挑战要求的及时效果”。此外，美国防部在计划制定、武器装备研制的“螺旋式发展”、采购周期、资源配置计划制定等方面都力求面向未来需要，从提高美军能力出发不断提高办公效益。

*第三大领域，合作方式转型。*美国防部认为，“对于单凭军事手段难以击败的恐怖分子或其它非常规对手来说，综合运用国家力量至关重要”。因而，要对军事力量和美国国家其他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转型，以保证“尽可能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军事力量”。不仅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之间，联邦、州和地方各级之间都要有“密切的合作”

总体转型战略

美军明确了从国防部到各军种的转型战略，并以此为指导逐步引导美军进入转型过程。

*一是通过创新性领导进行文化转型。*美国防部认为，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转型，必须鼓励一种创新冒险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又必须从国防部高级领导开始，创造一种自上而下的良好氛围。这样做不但可以实现国防部转型战略的职责，消除有碍转型的不良因素，还可以在全美军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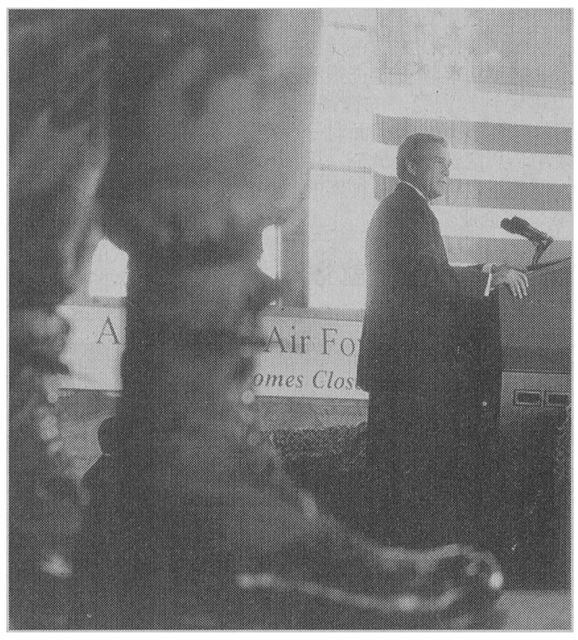
*二是程序转型。*即以未来作战理论为标准进行风险判断。美国认为，未来美军战略应基于能力消除任何威胁，现有的应对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合时宜，因而需要转型。但在转型过程中，不能削弱美军的能力，要“平衡风险”。

*三是通过部队转型实现能力转型。*军事力量的能力归根结底要落实到部队的作战能力，美军认为，如果投入大量资源满足近期作战需求而推迟对重要转型项目的投资，就会加大被对手超越的风险。推进军事力量转型，要加大对确信具有转型价值的具体技术和理论进行投资，以创造超前的领先地位。

军事转型包括四大支柱：

*一是强化联合作战。*美军认为，而联合作战发展的一个关键指标是互通性，因而联合作战发展将在各个层面上围绕互通性展开研究与实践。

*二是充分利用美国情报优势。*拉姆斯菲尔德在总结伊拉克战争胜利时将这一点列为赢得战争的六个重要原因之一，认为情报对赢得战争至关重要。美军将继续强化其预警、监控、识别、测定、侦察监视的能力，并加强情报一体化、情报共享和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互连互通能力的建设，以不断增强情报优势。



*三是理论发展与实验。*美军的理论与实验均走在世界各国军队前列。美军认为，理论的发展与实验密不可分。反复进行实验的目的在于评估新理论，评估结果用于完善新理论。要在各种观点交锋中求得最佳理论，要在各种可能环境的实验中验证这些理论。

*第四大支柱是发展转型能力。*为大力推进转型，美军制订了一系列措施来保证转型的进行。一是制定转型路线图。转型路线图是实现预想的联合作战理论的基本计划，各军种提出涉及支持联合作战理论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二是转型的研究、发展、实验和评估。三是训练转型。四是联合教育转型。

■战争与和平

战争在非接触中蜕变

□潘友木

非接触战争脱胎于接触战争，而高于接触战争。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作战一方能够在另一方的能力范围之外打击对方，决胜负的关键是一方不接触另一方的能力范围，打击是单方的。进入20世纪后期，随着高新技术不断物化成为新型武器装备，武器装备形成的“代差”促使作战双方的非对称性优势格外突出，客观上推动了非接触战争的形成。非接触战争作为一种全新战争形式，带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它的出现标志着战争形态已经发生质的蜕变。

非接触战争所达成的“零伤亡”效果，是战争形态发生蜕变的标志之一。力争以最少的伤亡代价获取战争的胜利，是推动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传统战争制胜之道主要是在时间、空间、有生力量和物质等方面的比拼中消耗敌人，通过消耗达成战争目的。战争之所以无法摆脱消耗战的阴影，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快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能力。冷兵器时期，战争是通过人的体能对抗来实现的，战争的决定因素是兵力。热兵器时期，战争是通过火力对抗来实现的，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火力。而兵力与火力的对抗只能带来伤亡和毁灭。当信息技术与武器装备的结合使得信息在战争中起主导作用时，以精确制导弹药、巡航导弹、全球定位系统和隐身飞机等兵器打击对方，以较少伤亡特别是己方的“零伤亡”获得胜利成为可能。于是，充分利用自己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压缩敌方的作战范围，并在敌方主战兵器毁伤范围之外打击敌人的非接触战争，以“零伤亡”的战争效果成为高技术兵器一方对付低技术一方的一种制胜之道。可见，非接触战争已改变传统战争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消耗模式，标志着战争形态的目标和效果发生了蜕变。

非接触战争打击手段的可选择性是战争发生蜕变的标志之二。在传统的战争中，作战对象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组织的国家集团。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许多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世界上已很少存在以掠夺土地为目的的战争，相反，为了意识形态和控制世界交通要道、重要石油资源而衍生的战争不断出现。这时的战争对象已开始发生变化，打击持不同治见者成为战争一个目的。发动战争打击这些对象，可以采取接触性的作战，如美国入侵巴拿马、出兵索马里。也可以以非接触袭击的方式，如美军空袭利比亚、伊拉克、南联盟；也可以采取非接触与接触相结合的方式打击对方，如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相对于接触战争，以非接触战争的方式打击这些对象，可选择巡航导弹攻击、远程轰炸机奔袭和隐形飞机偷袭等多种手段。更为重要的是，非接触战争对时机、发射阵地和打击目标的选择都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可避免因为入侵一个国家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被侵略国家的强烈反抗；可避免因为对方有较强的军事实力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给己方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可避免陷入持久战的泥潭而导致战争升级。非接触战争可用于国家间对抗及国家对少数人打击的灵活性，标志着战争形态的打击手段发生了蜕变。

非接触战争中天候与地形的作用明显下降是战争发生蜕变的标志之三。长期以来，天候条件一直是影响战争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非接触战争中，由于作战时机完全掌握在攻击一方，攻击者可根据天候条件灵活选择攻击的时间，从而避开可能影响远程打击兵器攻击效果的恶劣天气。另外，制导方式的复合化，使得影响一种制导方式的天候不再作用明显。目前，精确制导常采用红外、电视、地形匹配、卫星定位等多种方式，避免了雨、雪、雾和夜晚多重影响。地形在以往的战争中也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地形之利在于，善于利用地形的战术性能，可以最有效地发挥火器和技术兵器的性能，实施机动隐蔽和给敌人以突然打击，进行伪装和保护部队免遭敌人火力的攻击。对于弱者，利用地形可改变战场态势，缩小与强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对于强者，利用地形则可使优势更加明显，否则就可能因为地形不利导致由强变弱。但在非接触战争中，地形对作战的影响非常小，几乎不起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非接触战争侦察监视和通信系统向空中和太空转移，克服了地面地形的影响；非接触战争采取的超视距远程精确打击，限制了对方利用地形进行隐蔽和机动的能力。非接触战争对天候与地形条件要求的降低，标志着战争形态的外部条件发生了蜕变。

非接触战争的可控性是战争发生蜕变的标志之四。战争一经发起，就将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这是对传统战争的历史性总结，表明了战争的不可控性。这种不可控性主要表现为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和战争时间无限期延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发动战争者总想凭借自己的军事优势或突然袭击，力争占领他国领土和消灭敌方大量有生力量。这种战争目的往往引起战争另一方的顽强抗击，导致战争双方不断增加人员和武器数量，最终导致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而非接触战争则不同。首先是战争发起一方不再因为战争目的的一厢情愿而不断扩大战争规模，进而在宏观上掌握着主动权。拥有优势的战争一方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即集中高技术兵器，对敌方关键性军事战略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使敌方慑于严重的战争后果被迫做出妥协与让步，从而实现有限战争的目的。其次，进行非接触战争一方在战争的具体组织实施上享有更多选择的主动权。非接触战争中，战争目标的选择、战争时机的确定、打击样式的使用、战争节奏的把握都控制在发起者手里，战争的方方面面便容易被控制。从非接触战争的另一方来说，因为没有打击对方的手段，在处处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希望战争早点结束，这从另一个角度使战争变得更加可控。从近年来美国实施的几场“非接触战争”的实践看，美国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摧毁预定目标，结束战争。而且，战争过程中，进攻一方大量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命中率高，附带损失少，始终将战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与传统战争相比，无论在战争持续的时间、战争范围和战争伤亡等方面都表现出更强的可控制性，标志着战争形态的过程发生了蜕变。